

漢鏡銘文圖集



上册

王綱懷 編著

中西書局



漢鏡銘文圖集

(上冊)

王綱懷 編著

中西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漢鏡銘文圖集：全2冊 / 王綱懷編著．—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6.4

ISBN 978-7-5475-1048-3

I . ①漢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古鏡—銅器(考古)—金文—中國—漢代—圖集 IV . ① K875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048135 號

漢鏡銘文圖集





西漢文帝時期
(公元前179~前157)

圖1



圖86

西漢景帝時期
(公元前156~前141)



圖94

西漢景帝時期
(公元前156~前14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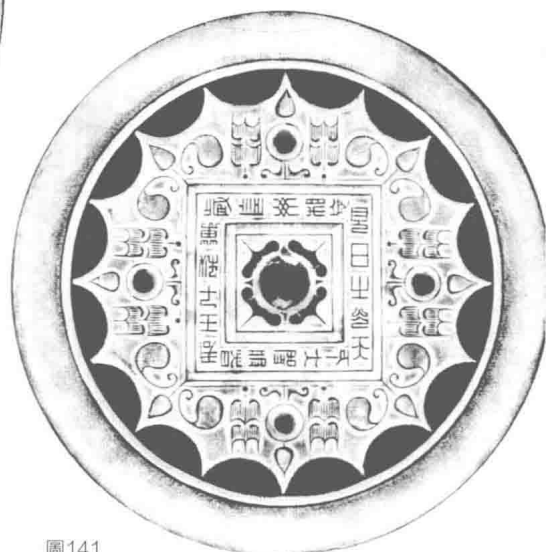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41

西漢武帝時期
(公元前140~前87)

新莽時期
(公元9~23)



圖311

西漢晚期
(公元前48~公元8)



圖217



圖210

西漢晚期
(公元前48~公元8)



圖119

西漢武帝時期
(公元前140~前87)



新莽時期
(公元9~23)

圖310



東漢早期
(公元26~88)

圖356



圖358

東漢早期
(公元26~88)



圖363

東漢中期
(公元89~146)

東漢獻帝時期
(公元190~200)



圖493

東漢靈帝時期
(公元168~189)



圖47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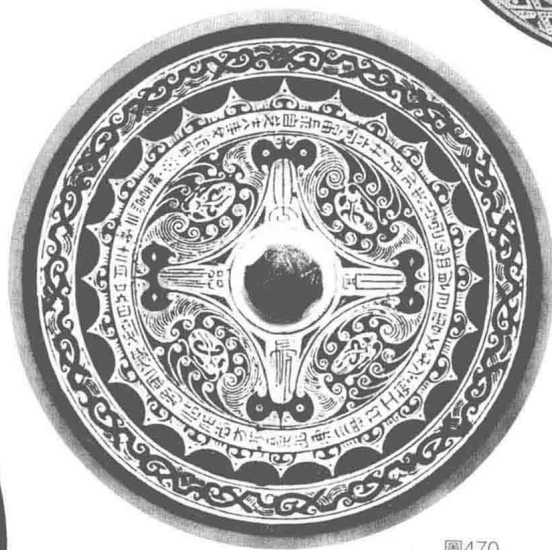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70

東漢桓帝時期
(公元147~167)



圖369

東漢中期
(公元89~146)

序言

李學勤

王綱懷先生的《漢鏡銘文圖集》一書即將出版，蒙以全稿賜示，我得以先見，覺得非常欣幸。

近些年我曾幾次呼籲，應該把古代銅鏡的研究，從一般的青銅器研究中分離出來，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分支來看待。其所以提出這樣主張，是鑒於我國的銅鏡自創生以來，就與其他青銅器有不同的傳統。不僅由工藝或美術等角度看是如此，即使談到銅鏡上的銘文，也和其他青銅器品類的銘文迥然有別。況且在“改革開放”後的這幾十年，銅鏡的發現層出不窮，公私收藏較之過去何止倍蓰。這已經為銅鏡的專門集中研究準備了充分的條件。

同其他出土文物一樣，整理研究的最基本最必要的步驟，對於銅鏡也是分域和分期。然而銅鏡傳流應用的歷史，比之其他青銅器要長遠得多。我以前曾經說過，銅鏡的發展歷程總的來講有三個高峰，即戰國、漢代和隋唐，而據學術史的實際而言，漢鏡的研究是整個銅鏡研究的入手處和基礎。至於說到銅鏡上的銘文，實際只有漢代稱得起高峰，最為豐富多彩，乃是鏡銘研究的入手處和基礎。

研究鏡銘，當前最重要的一步便是儘可能地將不同類型的銘文搜索齊備。這一點說來容易，其實需要很大的努力和功夫。不要忘記，早年以容庚先生那樣博洽的學者，在撰著《秦漢金文錄》和《金文續編》時設想兼收鏡銘，竟也未能實現。今天的情況，自然更令人為難了。同時，鏡銘的分域、分期，還必須結合銅鏡本身分域、分期的工作，只有做到如此，才能知道在哪個時代、什麼期間，流行怎樣的鏡銘，銘中的文字又具有怎樣的特點。

或許有人會以為，漢鏡銘文已經超出了古文字學所界定的範圍，是所謂“今文”了，這些銘文的釋讀是否要比較簡易呢？事實並不如此，鏡銘的正確寫定和訓釋每每

是相當困難的。須知道，漢鏡銘文出於匠師之手，早期仍殘留前代古文字某些成分，後來則多有省簡譌變，常見音近通假，不像青銅禮器那樣要求規範。不少種鏡銘文字變化莫測，有些地方迄今沒有真正解讀，懸為疑案。

這裏試從這部《漢鏡銘文圖集》中拈取一個例子。《圖集》圖四八至五〇西漢早期“與天相壽”銘鏡都有“富貴如言”一句；圖一八一、一八二西漢中期的草葉紋鏡也有同樣文字。王綱懷先生在圖一八一的“鑒評”中說：“言通意，如言即如意。”這是很對的，發前人所未發。按《說文》云，“意，志也，从心察言而知意也。从心从音”，把它講做會意字，以為從“言”或“音”，失之穿鑿。“意”字其實是從“音”的，《金文編》引戰國時令狐君壺銘文“祈無疆至於萬音年”，即是以“音”通代所孳乳的“億”字。鏡銘“如言”，其“言”字應改釋為“音”，不過有些變形，以致同“言”字混淆而已。

“意”寫為“音”，可能便是由先秦遞傳下來的，作鏡銘的匠人未必很瞭解這一點。類似的情況，我前些時候寫過一篇《日光鏡銘新釋》（《文博》二〇一三年第一期），推測常見的“見日之光”銘文的“見”乃是先秦多有的“見”字，當讀作“視”，意思是“比”。這個例子同樣是古文字的遺留，後來人們或者已全忘記。

漢鏡上的文字，風格大多與同時期的簡帛比較接近，只是更趨苟簡一些。漢代簡帛不少，已有很多的文字編問世。鏡銘的文字編，據我所知也有學者在準備中。王綱懷先生的這部《漢鏡銘文圖集》，正為文字編的編纂開拓了前路。

我知道王綱懷先生對漢鏡銘文做了鍥而不捨的深入研究，積累了許多新穎見解，讀者可以在本書的“鑒評”中見其一二。他還通過鏡銘文字發展演進的軌迹，進而探討兩漢文字嬗變的整個歷程及其種種特點，希望能早日讀到他的最新成果。

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於清華

前言

在四千年的中國銅鏡史中，漢鏡承擔着承前（戰國）啓後（隋唐）、繼往開來的歷史重任。比較而言，漢鏡的歷時最長、存量最大、銘文最多。本書對漢鏡所處的年代，主要指西漢、新莽、東漢、三國等四個歷史時期（簡稱兩漢三國）。

中國銘文鏡起源於西漢初年。漢鏡銘文內容有着與漢文化密切相關的近五百年歷史。其多姿多彩的銘辭，蘊含着豐富的歷史信息，是研究古代政治、經濟、哲學、文學、美學、民俗等方面的一種實證；漢字從圓轉的古文字秦篆演變成方折的今文字漢隸，稱作隸變（可參本書圖一九四、二〇八、三三七），主要發生在西漢中晚期，故而漢鏡銘文還是書體演變的一個史證；漢鏡及其銘文，始終受到歷史文化、考古博物、語言文字、數學物理、冶金鑄造、工藝美術等學科的重視（參見《漢鏡文化研究》），故而又是研究中國文明進程的重要領域。

漢鏡銘文在以後的歷朝歷代備受關注。尤其在近百餘年來，海內外諸多專家學者，因注重漢鏡銘文的文化內涵與精美書體，曾進行過大量的收集和整理，遺憾的是數量有限，且無圖片，未知紋飾，難斷年代。經過十餘年的尋覓與搜索，筆者儘可能地蒐集海內外文獻資料、各大藏館以及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圖片，總共積聚了有銘漢鏡圖片五四二幅（主要是拓片），並用圖文並茂的方式將其聚於本書，以奉獻讀者。

李學勤老師再三呼籲對漢鏡進行分期分域的研究，筆者感同身受。一個多世紀以來雖面臨諸多困難，然還是有中外學者進行了若干有益的探索。漢鏡分期分域的最大困難在於資料不足，尤其是出土資料的欠缺，在有限的出土資料中可供斷代的資料更是難得。筆者認為，就目前的條件來看，做得太粗沒有意義，做得太細又力不從心，只能是做些儘力而為的嘗試。為此，本書對已有的五四二面銘文鏡，進行了九個項目的分類，並在每個分類前稍加說明。前八個分類，按大致的年代順序來安排，其中包

括：甲類，西漢早期（前段計二七年，十五面；後段計三九年，九四面）；乙類，西漢中期（計九二年，八八面）；丙類，西漢晚期（計五七年，八三面）；丁類，新莽（計十七年，五七面）；戊類，東漢早期（計六四年，二五面）；己類，東漢中期（計五八年，二二面）；庚類，東漢晚期（計七四年，六〇面）；辛類，三國至六朝（計三六九年，十面）。最後一個分類單獨列出，即：壬類，兩漢至六朝紀年鏡（計五四六年，八八面）。在分類說明中，本書對年代、地域、風格、鈕式、主紋、文化、經典、指要等方面，作了簡單說明，期盼得到讀者的歡迎。

爲方便讀者瞭解與熟悉漢鏡銘文，本書還加入了十六頁（共二三幅）彩版，書後又列入了三個附表：附表一“兩漢三國紀年鏡索引”（共二二八條），附表二“本書以外之漢鏡銘文輯錄”（共一〇四條），附表三“漢鏡圓周等分（連弧）數字一覽表”（共三七條），以及“主要參考書目”（共六七種）。通過附表一中主紋的變化，可以瞭解鏡種的發展與變遷。

漢尺一尺即今公制二三·一厘米，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尺度標準，由東周早期到東漢末年，其使用時間長達六個多世紀。由本書可知，漢鏡的直徑從漢尺三寸（六·九三厘米，本書圖五九、六四）至十二寸（二七·七二厘米，本書圖一四〇、二七三）的十個整數規格全部包括。爲瞭解漢鏡的用銅量標準並方便比較，本書引入了單位面積重量 m 值（克/平方厘米）的數據。對於若干東漢晚期的高凸鏡面（可擴大照容範圍），本書還納入了凸面曲率半徑的概念，而且可以發現，其數值多在漢尺三尺（六九·三厘米）左右。由於鑄制、丈量等諸多原因，凡長度數據皆有誤差。與標準尺寸數據相比，小於正負百分之二者，本書將其確認為嚴格執行當時的度量衡標準，並給以括注；反之，則不予標注。本書未能標注直徑、重量等數據者，多係古籍資料，原書就未見。

由本書內容可知，若干今日所用之簡體漢字，早在兩千年前的漢代就已出現，可謂傳承有序也！如：圖二九二、二九五、三〇八、三一八、三五〇之“万（萬）”字，圖三三〇之“为（爲）”字，圖三四九、三七一、三八二、三八三之“盖（蓋）”字，圖三八一、圖四四四之“后（後）”字，圖四四三之“无（無）”字，圖五一—之“亲（親）”字。

在客觀記載歷史文物的同時，書內關於“年代”與“鑒評”兩項內容，主要是筆者個人學習心得的記錄，在本書中不揣冒昧地展現於衆，期許能給讀者提供一些參考。作爲嘗試，本書一定會有許多不足乃至錯誤之處，誠盼得到讀者與方家的批評指正。

關於漢字演變與鏡銘書法的問題，在編寫《三槐堂藏鏡》（2004年）一書時，筆者就生研討之夢，然苦於資料缺乏，只能是淺嘗輒止。十余年來，新資料多有出

現，依據本書，筆者得以深入研討，致《漢鏡銘文書法》（附：漢鏡銘文字形表）亦同時出版。

在本書即將付梓之際，有幸得知江西南昌第一代海昏侯劉賀墓出土了兩面清白鏡，大者約漢尺七寸，有三一字銘文，小者約漢尺五寸，有二四字銘文。由此可知，清白銘圈帶鏡之問世年代，主要在西漢中期偏晚的昭帝時期。這就為圈帶銘文鏡的斷代問題，提供了切實可靠的依據。

本書問世正值羅振玉《古鏡圖錄》（1916年）出版一百週年，藉此對前輩們的卓越貢獻表示誠摯敬意！更期盼後人更上一層樓，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與研究，推向新的高度。

本書的資料收集，除了引用海內外諸多博物館、美術館的相關專著之外，還得到了辛冠潔、李學勤、陳來、俞彗鈞、趙平安、劉國忠、陳佩芬、傅舉有、蔣宏傑、岳洪彬、程林泉、郭妍莉、李新城、邱龍昇、鵬宇、孫克讓、梁鑒、林以彬、孫小龍、陳學斌、孔震、葉德舜、張宏林、徐也力、海鳴、朱軍強、趙亞弟、桑國民、毛軍亮、黃洪彬、陶慧、陳亮、魏秀英，以及林素清、陳燦堂、莊靜芬、樋口隆康、岡村秀典、森下章司、千石唯司、岸本泰緒子等海內外專家、學者、同好、友人的大力支持，在此一併致以衷心感謝。

本書的出版，還得到馮遠先生之題簽與中西書局的鼎力支持，在此特別表示感謝。

王綱懷 丙申立春



彩版1上 圖1 脩相思銘纏繞式三鳳蟠螭鏡



彩版1下 圖47 西王母銘純文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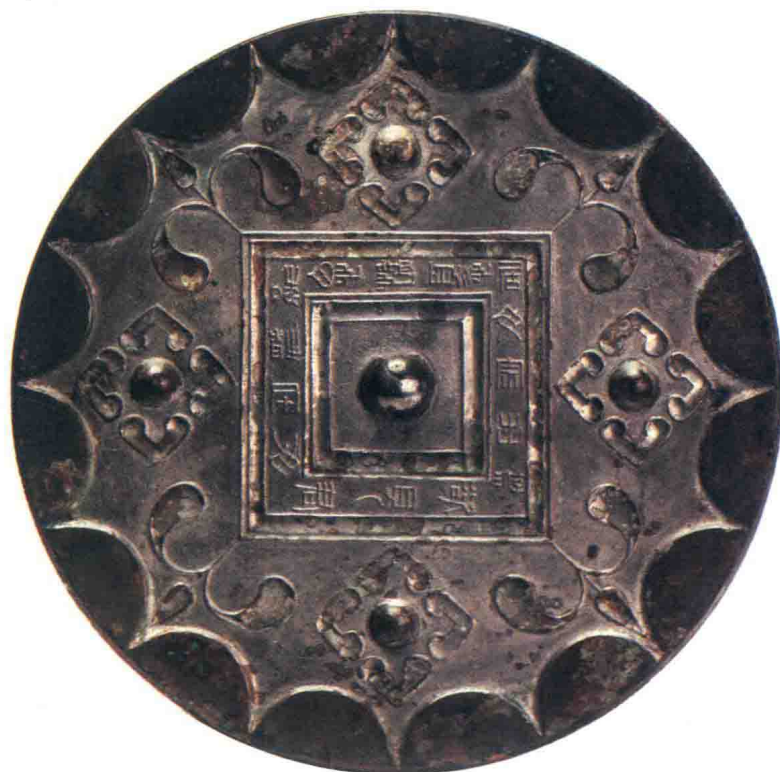
彩版2上 圖52 昭美人銘變形花瓣鏡



彩版2下 圖79 美宜之銘連弧四乳鏡



彩版3上 圖81 與衆異銘連弧四乳鏡



彩版3下 圖86 居毋宗銘花瓣鏡



彩版4上 圖94 與天無極銘連弧花瓣鏡



彩版4下 圖111 日光（久長）銘草葉鏡